

· 目录学研究 ·

专栏导言

复旦大学 吴 格

本期刊载目录学研究论文三篇,时代分别关乎清乾隆、嘉道及民国三十年代,讨论涉及《四库提要》文本系统、《爱日精庐藏书志》撰者张金吾之抄书活动,及清季四大藏书之一海源阁藏书散出期间之记录,均属中国目录学、藏书史的热点课题。兹经作者爬梳史料,切换角度,深入研究,所获足以发人思考,益人心智,披读之下,感慨良多。

《〈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一文,受已故刘浦江先生对《小字录》诸提要研究之影响,进而提倡对《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之关注。对于《四库提要》诸文本存在之差异,作者认为“前人往往将其归结于不同时期对提要文本的修订,但这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则提要可能具有多种提要稿,即不同的源文本,而不同的源文本也产生了不同的提要文本系统”。作者以《孝经大义》《孝经注疏》为例,“指出提要文本之间巨大的差异并非是流传、修订产生,而是由于提要稿依据底本不同所致。进而指出存在不同分纂官分别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分纂稿、不同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同一版本撰写的分纂稿、同一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多种分纂稿等三种产生不同源文本的情况。”同书而提要有多稿,多稿或出一手、或出众手,揆诸事理,合于常识,结论应予支持。至于认为“提要文本系统的提出有利于推进《四库提要》研究的立体化与精细化,进一步深化《四库提要》研究”,则何谓“立体化”,何谓“精准化”,尚待付诸实践。依个人经验,官修大典一经结束,未必会有意保留纂修过程中各文本。今去乾隆后二百余年,《四库提要》之源文本及各阶段中间文本,必有缺失。如承认源文本及中间文本之缺失为实况,是否对构建不同的文本系统仍具信心?如认可现存《四库提要》诸抄本分属不同之源文本,是否即能达成研究“立体化”和“精准化”?顺便说来,通行本《四库提要》以外,南北图书馆近年所发现之若干《四库提要》抄本,介绍者之定名与阐释,是否准确可信,足以支撑文本系统之建立?进而言之,呼吁建立《四库提要》之文本系统,是否较之对《四库提要》内容之研读更为紧要?

《张金吾抄录书籍考——基于《爱日精庐藏书志》与相关题跋的研究》一文,统计《爱日精庐藏书志》入录诸书之来源,指出张金吾所著录之善本中,至少有五分之一弱,为得自“缮抄秘阁”“假录相知”之传抄本,说明直至清代中期,传抄仍为藏书家增益图书的必须手段。作者利用馆藏,深入考察张氏自黄丕烈处传录之图书多部,结合两位之藏书题跋等数据,梳理各抄本之来源及去向,以张氏大量向黄氏及他人借抄图书之事实,展示当日藏书家之间互动情景。作者又指出,士礼居所藏珍本先后经藏书家传录,造成存世诸抄本之同源关系。今日读者对于抄稿本之认识,一般依赖图书馆目录之指引,而图书馆古籍馆员对于稿本、抄本之鉴定著录,向来为工作难点。充分利用联合目录及藏书题跋,厘清抄本之来源及复本,给抄本以恰如其分之版本判断,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使命。图书馆近年所从事古籍普查已获阶段性成果,初步厘清古籍存量后,接续之任务,自应对古籍尤其是善本之底本来源、流传途径等,有更深入的研究与介绍,为存世典籍建立各自身份之准确档案。

《〈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的文献价值》一文,利用新近影印面世之《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发现所著录当时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之宋本三十三种、元本二十三种、校本二十一种、抄本十九种,明本一种(合共九十七种),乃上世纪三十年代海源阁藏书流出时之珍贵记录。海源阁藏书之散出及日后入藏北图,是近代藏书史中重要事件。作者通过查证《书目》中著录之古籍,结合相关的资料分析,推断其出于民国间版本学家傅增湘之手,《书目》系傅氏访书盐业银行时匆匆所记,虽体量不大,且非严格意义之书目,属于藏书家之“访书记录”,及其流传后世,却可为追踪海源阁藏书流散过程补充若干细节,正所谓竹头木屑,各有其用。此本见于《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非遇识者,极易为人忽视。南图收藏此本数十年不失,今将其选入《丛刊》,公诸于众,真称文献之幸。图书馆人守护之功,又因文献学者之重视,据此戈戈小册,逐条爬梳,追根寻源,还原出海源阁藏书散出时周叔弢、傅增湘等前辈学人先后至盐业银行访书等细节,遂令此本久晦之后,仍不失其用。观此图书馆人与文献学人之良性互动,不禁令人额手称庆,赞叹不已。

本期为“文献学基础”专刊,文章选题分别属于目录、版本、校勘这三个文献学最基础的分支。文献学为从事古代文化研究之基础学科,久已成为通识,而目录学又为基础之基础,日益引人注目。本栏目所收论文三篇,皆能从目录出发,以小识大,不厌其烦,借目录以探讨图书流变,揭示学术脉络,从而践行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传统。文献不亡,学术常新,目录学研究贯穿古今,风清气正,后来居上,正未有竟期。